

壹

「周邊」的重新界定：移動與變化的「中國」

要說明「周邊」，應當先說明「中國」。

原本「中國」並不是問題，「中國」之成為問題是在晚清民初，即張灝所說的「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」（1895–1925）。^[1]眾所周知，晚清民初是一個各種觀念激變與衝突的時代，也是一個由於進入現代「國際」需要重新定義「國家」的時代。在「中國」起源與界定這一問題上，當時大致有三個說法相當流行，即「中國文化西來」說、^[2]「苗先（原住民）漢後（外來

[1] 張灝〈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〉，《二十一世紀》第52期（1999年4月號），頁29–39。

[2] 拉克伯里（Albert Terrien de Lacouperie）的《初期中國文明的西方起源》和《漢民族以前的中國諸語言》等著作，提出「中國文化

者)』說、^[3]「中國本部說」，^[4]在當時這些說法對中國的自我認識

西來說」，通過日本轉手傳來，在晚清民初影響很大。使中國學界深受刺激，當時便引起了好多討論，很多學者如章太炎、劉師培、梁啟超、蔣智由等都受其影響。這一話題研究論著很多，中文世界最新的研究，參看孫江〈拉克伯里「中國文明西來說」在東亞的傳佈與文本之比較〉，載《歷史研究》(北京) 2010年1期，頁116-137。

- [3] 例如1903年蔣智由(署名觀雲)在《新民叢報》第三十一號上發表〈中國上古舊民族之史影〉，就引用日本學者鳥居龍藏、田能村梅士等人的說法，贊成苗族是中國最早的土著，而漢族是後來外來人種。一開頭就說，「先吾種族而為中國之主人翁者誰乎？則苗族是也。苗族始據中國腹地而後退敗零落，棲息於南中國一隅之地者也」。(頁1)
- [4] 「中國本部」的說法，有學者指出，英國學者William Winterbotham在1795年出版的*Historical Geographical and philosophical View of the Chinese Empire* (London, 1795; Philadelphia, 1796)中，就已經把清帝國疆域分為「China proper」(本部)、「Chinese Tartary」(韃靼)，和「States Tributary to China」(朝貢國)。這個看法淵源很久影響很大，如J. B. Harley和David Woodward所編的《世界地圖史》(1992)第二卷，也把中國區域分為兩個區域，一個是中國本土(China proper)，一個是西藏與蒙古。見韓昭慶〈康熙《皇輿全覽圖》與西方對中國歷史疆域認知的成見〉，載《清華大學學報》2015年6期，頁123。但我個人的看法是，「本部」這一概念真正發生影響，仍是來自明治時期日本學者的說法，他們用現代民族國家的某些要素來衡量中國，強調大清帝國並非一個國家，滿蒙回藏鮮都不是「中國」，「中國」只是長城以

衝擊非常之大。到了1920年代出現「古史辨」運動，它對傳統文獻與古代歷史的質疑，不僅帶來了對傳統古史的破壞，也逐漸摧毀了「出於一源」的歷史觀。^[5]在舊的中國歷史起源說摧毀之後，便逐漸出現各種新的歷史解釋。自從1927年徐中舒(1898–1991)發表〈從古書中推測之殷周民族〉，^[6]同年蒙文通(1894–1968)出版《古史甄微》，^[7]1933年傅斯年(1896–1950)

南的漢族地區。參看葛兆光《宅茲中國：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》(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1)，頁242–246。

- [5] 古史辨的綱領，用顧頡剛的說法，就是(一)「打破民族出於一元的觀念」；(二)「打破地域向來一統的觀念」；(三)「打破古史人化的觀念」；(四)「打破古代為黃金世界的觀念」。見顧頡剛〈與劉胡二先生書〉(原載《讀書雜誌》第十一期，1923年7月1日)，收入《古史辨》(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本，1982)第一冊，頁96–102。
- [6] 徐中舒〈從古書中推測之殷周民族〉，先舉四證說明「殷周非同種民族」，又說周滅殷後苗黎與周民族「漸次混合，遂成為今日中國之漢族」，秦漢時代苗黎之遺存黔首蒼頭也漸漸消失，「種族之界限漸泯」，後人則不知古代民族之不同來源。載《國學論叢》第一卷一號，頁109–113。
- [7] 《古史甄微·序》(《蒙文通文集》第五卷，成都：巴蜀書社，1999)，王汎森認為，蒙文通的問題意識，源於其師廖平「破舊說一系相承之謬」的追問，見王汎森〈從經學向史學的過度——廖平與蒙文通的例子〉，載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編《蒙文通先生誕辰110周年紀念文集》(北京：線裝書局，2005)，頁152–169。

出版《夷夏東西說》，^[8]1943年徐炳昶(1888–1976)出版《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》以來，^[9]學界對於古代「中國」大多放棄「唯一起源」和「單線歷史」的說法。近年影響很大的蘇秉琦(1909–1997)《中國文明起源新探》，更把中國史前文明分為六大區域(燕山南北長城一帶；山東為主的東方；關中、晉南、豫西為主的中原；太湖為中心的東南；洞庭及四川；珠江三角洲的南方)，提示了古代「中國」族群和文化的多源。^[10]既然古代文化與族

[8] 傅斯年《夷夏東西說》，《傅斯年全集》第三卷，頁226。

[9] 徐炳昶《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》，桂林：廣西師大出版社重印本，2003。

[10] 蘇秉琦《中國文明起源新探》(瀋陽：遼寧人民出版社，2009)，頁29–30。蘇秉琦的說法，最早是在1981年，他與殷璋璋合作的〈關於考古學文化的區系類型問題〉中提出來的，他指出，在中國發現的新石器時代文化面貌有「諸多差異」，除了少數可能「前後繼承」外，其他的各有淵源，儘管黃河流域在歷史上起到重要作用，但是「其他地區的古代文化也以各自的特點和途徑在發展著」，見《文物》1981年第5期，頁11；後來，嚴文明也提出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格局如同「重瓣花朵」的說法，而張光直也提出早期中國文化的「中國交互作用圈」的說法，這些說法與蘇秉琦的說法相互呼應，說明早期文化各個區域多樣性的存在。嚴文明〈中國史前文化的統一性和多樣性〉，載《文物》1987年第3期，頁38–50；張光直〈中國交互作用圈與文明的形成〉，見《慶祝蘇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論文集》(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1989)，頁151–189；俞偉超曾指出，蘇秉琦的這些主張在1980年代中國考古學界佔據主流的位置，見曹兵武、戴

群都未必「出於一」，因此，所謂古代「中國」也無法簡單地「定於一」，古代中國之族群也無法簡單地說它們都是「炎黃子孫」。換句話說，就是我們無法簡單地認定現在這個「中國」，自古以來就是一個文化、民族、語言的共同體。^[11]

一 從〈禹貢〉到《史記》：「九州」與「中國」

有立場的歷史敘述，往往與無意識的歷史事實不同，儘管古代中國的文化與族群未必「出於一」，但歷史敘述卻始終在努力構造其「出於一」。在司馬遷把各種來源不一的古代資料寫進一部《史記》，從而建立了古代中國歷史的主脉之後，所

向明〈中國考古學的現實與理想——俞偉超先生訪談錄〉，王然編：《考古學是什麼》（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1996），頁229。

- [11] 許宏《何以中國：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圖景》曾經引用日本學者黃川田修的說法，把早期中國從二里頭到春秋時代稱之為「國家群」，說「早期王朝絕非單一的國家（state），它是由無數的諸侯國構成的國家聯盟，應總稱為國家群（state complex）」。（頁144）最近，他在〈中國考古學界國家起源探索的心路歷程與相關思考〉中又指出，仰韶龍山時代的長江黃河流域，特點是「滿天星斗」和「邦國林立」，所以可以叫「古國時代」、「邦國時代」，或者借用歐美學界的說法，叫「酋邦（chiefdom）時代」，載《中原文化研究》（鄭州）2016年2期，頁15。

謂「其先出於黃帝」、「其先出於帝嚳」或「其先出自顓頊」之類的傳說，和所謂「三皇五帝夏商周，秦漢唐宋元明清」一脈相承的歷史敘述，就在傳統經史典籍中凝固成形。^[12]其中，對古代「中國」的描述，過去學界常引述《山海經》、《周禮》和〈禹貢〉等文獻。不過，《山海經》只是想像古代中國四周的神話傳說，^[13]《周禮·職方氏》只是古代學者規劃天下的最早藍圖，都不能算真正有關古代「中國」疆域的歷史文獻。唯有〈禹貢〉一篇雖然多有爭議，但由於近來出土資料可以佐證其觀念與傳說之早，因而頗受學界關注。^[14]儘管它的「九州」之說，不免也

[12] 《國語》、《左傳》、《世本》等等先秦典籍，往往把不同地域、來源、風俗的族群，納入一個歷史脈絡，特別是在《史記》中形成一種整齊的敘述形式，使得原本來源不一、族裔複雜的「中國」有了一個共同歷史。

[13] 最早如日本小川琢治〈支那戰國以前の地理上智識の限界〉就以《山海經》來討論戰國以前古代人對「中國」的認識，認為那時大體上就已經形成東北為燕、遼東，北為趙、秦即沙漠南界，東為田齊即黃海沿岸，南方為楚即江南地方的空間，載《藝文》第六年（1915）第四號，頁15-40。

[14] 在提到大禹的傳世文獻中，王國維說西周中葉宋人所作之《詩·商頌·長發》為最早。顧頡剛曾認為，那個時候大禹還是天神，到了《詩·魯頌·閟宮》和《論語》之後，大禹才成為人中之王，但此時已是春秋、戰國時代。王國維對顧頡剛的說法不以為然，覺得顧頡剛「頗與日本之文學士（白鳥庫吉）同」。見《王國維全集·書信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4），頁

是來自傳說加上想像，但它多少透露古代人有關「我者」的一些認知，所以勉強可以算是描述古代中國疆域最早的文獻，1930年代面臨國族危機時代，中國歷史地理學家以「禹貢」作為研究中國疆域刊物的名稱，1980年代面對中國轉型，一批海外學者以《九州》作為研究中國文化刊物的名稱，也許都表達了這一觀念。

根據〈禹貢〉呈現的觀念來看，「九州」可能很早就成為「華夏」自我界定的範圍，^[15]殷周兩代也初步形成了一個「共同體」

325–326。他在《古史新證》（北京：清華大學出版社，1994）第二章就論及大禹，並以1919年甘肅禮縣新出「秦公敦（簋）」和宋代著錄的齊侯罇鐘（即叔弓罇）為例。最近，由於新發現夔公盨，年代在西周中期偏晚，裏面已經提到「天命禹敷土，隨山浚川」，所以，很多學者認為，這證明大禹治水的傳說來源很早。參看李零《三代考古的歷史斷想》，原載《中國學術》（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2003），收入李零《待兔軒文存（讀史卷）》（桂林：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，2011），頁79–80；唐曉峰〈禹貢的經典化〉，見唐曉峰《從混沌到秩序——中國上古地理思想史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0）第十一章，頁260–285。

[15] 有關大禹治水劃分九州的傳說，證之早期文獻如《左傳》襄公四年魏絳引〈虞人之箴〉的「芒芒禹跡，畫為九州」、叔弓罇的「咸有九州，處禹之堵」。可見，把「九州」看做一個共同空間的觀念，可能在周代就已經出現。上海博物館收藏的戰國楚簡〈容成氏〉記載大禹治水和「九州」，只是它的「九州」與〈禹貢〉略有差異，據李零釋文及注解，其中有兗州、徐州、青州（或

的基礎。^[16]不過也應當指出，即使在殷周兩代，在實際的政治與制度上，畢竟還是列國分封。儘管名義上有商周之王作為天下共主，但實際上當時各種酋邦、各種諸侯各自為政，周邊環伺的蠻夷戎狄也未必真正認同這個「王」作為共主。^[17]那個時代的所謂「中國」，只是函谷關以東黃河中下游，^[18]既不

營州)、呂州、荊州、揚州、豫州、雍州等。見馬承源主編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》(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2)第二冊，頁268-271。

- [16] 杜正勝《周代城邦》(台北：聯經出版事業公司，1979)第一章曾引用《荀子·儒效》「立七十一國，姬姓五十三」說，周代依靠聯姻和殖民，形成中國對四方格局的共同體的基礎。但是，魯有殷民六族，衛有殷民七族，晉領懷姓九族，實際上這還只是一個初步和鬆散的共同體。
- [17] 所謂蠻夷之邦，也不把自己算在「中國」之內。如楚國，《春秋公羊傳》僖公四年說，「楚有王者則後服，無王者則先叛。夷狄也，而亟病中國」(注：數侵滅中國)。中華書局影印本，頁2249。而楚國自己，一直到戰國時代還不把自己算在「中國」裏面，所以《戰國策》(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78)卷十六〈楚三〉裏楚王自己講，相對於鄭、周，「楚，僻陋之國也，未嘗見中國之女如此之美也」，頁540。
- [18] 《史記》(以下凡引二十四史及《清史稿》，均為北京中華書局校點本，不一一注出)卷十二〈孝武本紀〉說，「天下名山八，而三在蠻夷，五在中國」。西漢也只是把直接屬於漢朝制度管轄的地方當作中國，並不把南方和邊地看成「中國」，頁468。一直到北魏還有人說，「漢之名臣，皆不以江南為中國，三代

包括西北之「戎狄」(如犬戎、獫狁)，也不包括南方之「蠻夷」(如吳、越、楚)，既沒有在制度上真正形成一個統一國家，^[19]甚至連北方即後來理所當然算在中國內的「幽、并、營」三州，也在九州之外，^[20]就是九州之內，也雜居了很多不同族群

之境，亦不能遠」，甚至連已經納入〈禹貢〉九州中的揚州、荊州，也只是「近中國」之地。見《魏書》卷五十四〈高閭傳〉，頁1208；又，這句話《北史》卷三十四〈高閭傳〉也有記載，頁1259。

[19] 顧頡剛〈秦漢統一的由來和戰國人對於世界的想像〉中說，「秦漢以前的中國，只是沒有統一的許多小國，他們爭戰併吞的結果，從小國變成了大國，才激起統一的意志，在這個意志之下，才有秦始皇的建立四十郡的事業」，《古史辨》(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本，1982)第二冊，頁1。這個說法雖然絕對一些，但大體不錯，可以瓦解自古中國即單線歷史的迷思。當然，後來傅斯年、張蔭麟等人對這個比較絕對的看法，也做了一些修正和補充。劉家和〈論先秦時期天下一家思想的萌生〉不同意這一看法，認為「殷周時期，中原大地上雖有小國的林立，但也並非沒有任何統一的趨向」，載《「中國歷史上的分與合」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(台北：聯經出版事業公司，1995)，頁20。但是，我個人認為，這兩說並不衝突，劉家和指出的只是「趨向」，並不是已經成形的「事實」。

[20] 顧炎武《日知錄》卷二十二「九州」說，「幽、并、營三州在〈禹貢〉九州之外」，其中幽州包括涿、易兩州至塞北，并州包括忻、代兩州至塞北，營州在今遼東大寧，古人心目中都不是九州之內，也不能算「中國」。《顧炎武全集》(上海：上海古籍出